



丹心映春秋

——记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教授孙志芳

周欢 李丽



1929年11月，孙志芳出生在天津一个实业家家庭，4岁时全家移居北京。父亲曾留法勤工俭学，母亲婚前在天津浙江公学任教。孙志芳是家中唯一的女孩，父母对于她和四个兄弟的教育都非常重视，加之她天资聪颖，故学习成绩优异，一路由北京师范大学附小、北京大学附中保送至燕京大学。在燕大历史系求学的四年里，她先后师从翦伯赞、邓之诚、齐思和、聂崇岐等史学大家，学习知识，汲取养分，茁然成长。专业学习中，除了对所学课本深入研究，她还广泛涉猎各类历史典籍，不断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从而深刻理解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真谛。

1952年大学毕业后，孙老师服从组织分配，先后进入天津师范学院（现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历史系工作，从此与三尺讲台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日常工作中，她潜心教学并笔耕不辍，处处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教育理念。

1956年，孙老师于《历史教学》杂志发表了题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反英斗争》的文章，并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文。作为一名青年学者，彼时的孙老师在史学研究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同年，孙老师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中国近现代史教材的编写工作。1960年，其学术文章《论邹容的思想》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刊出。1962年，孙老师所写《陈天华的爱国革命思想》一文被收录于中华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同年，她还在《历史教学》杂志发表了文章《太平天国的北征》。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孙老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一些问题上不断提出独到见解，自身研究能力逐渐增强。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合办 天津日报

在河北大学任教的21年间，孙老师从一名年轻助教逐渐成长为教研室主任，主讲中国近代史，并从事近代思想史的相关研究工作。那时工作环境简陋，生活条件艰苦，从小生活优渥的孙老师却没有半点怨言和不甘，白天从事教学工作，夜晚埋头编撰教材，虽劳累，但出于长久以来对史学研究的热爱，她从容沉静，自得其乐。

上世纪70年代初，孙老师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主要负责讲授中共党史以及中国近现代史课程。此外，她还兼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并担任中科大首届少年班的历史教师，讲授社会发展史。其间，她负责主编的《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一书获安徽省1978—1985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还独立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简编》和《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撰写，并参与编写了作为中学教师进修教材的《世界古代史》。

从教30余年来，孙志芳老师始终坚守在高校教育育人的第一线，用自己的学识和热情影响着每一位学子。孙老师的课备受年轻学子欢迎，学生们被她的渊博知识和独特见解所吸引，更被她那份对历史的敬畏和对学术的热爱所感染。她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鼓励他们勇于探索未知。她不仅致力于教学工作，还热衷于学术研究与交流，多次参加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包括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以及由安徽省举办的李鸿章历史人物研究学术研讨会等。她先后于1979年和1981年撰写的《论十月革命前后李大钊反帝思想的发展》和《试论义和团运动对辛亥革命的推动》两篇论文，分别作为重要文章在安徽省党史学会和安徽省历史学会年会上进行了交流。

孙老师在高校历史课讲台上坚守30余年，取得丰硕成果，从她的课堂上走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严谨史学思维和广阔视野的青年人才；从不间断进行研究，她的学术成果深化了史学研究领域内外对于近代史的认识，也为后来的相关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参考和借鉴。

1986年，孙志芳老师调入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先后在中共党史教研室和文史教研室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她在党校研究生班开设了“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课程，指导研究生完成毕业论文。其间，孙老师参与撰写了《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誓拼热血振兴中华——近代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等多部著作，其中《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一书荣获1989年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她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理论宣传工作的历史贡献》一文收录于《光辉的历程 庄严的使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一书。此外，她在《求知》杂志发表的《周恩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贡献》一文也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1987年，孙志芳老师被中共天津市委党校评为教授职称，评委们对她的评审意见为“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造诣较深，对中国近代史的某些问题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在史学界形成一家之言，具有一定的影响”。

在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十几年间，孙老师兢兢业业，备受尊重。她在课堂上的讲解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不仅为学员讲授史学知识，更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融入教学之中，让学员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其深厚的史学造诣不断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知识源泉，因此她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

“历史不是故纸堆，而是照亮未来的明灯。”孙志芳老师勉励后辈“深耕一亩三分地，治学也需要这样的专注”，她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为后辈树立了榜样，传递了学术薪火。在她的影响下，一批批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他们将孙老师的治学精神时刻牢记于心。孙老师常说：“学术之路，道阻且长，唯有持之以恒，方能有所成就。”即便是在晚年，她依然保持着对学术的热爱和对后辈的关怀。年轻学者来访，她讲述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心得与人生见闻，鼓励他们勇于攀登知识的高峰，为国家的昌盛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孙志芳教授执教党校，讲坛授业，惟求实；编撰教材，深耕史料，力求精当。她笔耕不辍，梳理津门党史，发掘红色根脉，躬身践行“史政相济”之道；治学严谨，诲人恳切，数十桃李成蹊，多为栋梁之材。此所谓师者传道，非唯章句，更在铸魂砺行矣！

（作者均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

学人小传

孙志芳，女，天津市人，1929年11月生。195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52年8月参加工作以来，先后任教于天津师范学院（现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共天津市委党校。40余年来在高等院校和党校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教学、科研和教学管理工作。主要著作有《李鸿章与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简编》《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正义必胜》等。发表相关论文10余篇。完成科研成果共计百余万字。曾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安徽省党史学会副会长，第三、第四届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入选首部《华夏妇女名人词典》，1994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社会步入数字时代，手机如同人体的综合外挂器官搭载越来越多的功能，人工智能正替代越来越多的人类角色完成社会职能。强劲的数字风暴没有给人类留出按部就班的适应时间，变化接踵而来。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人体，家庭就是组成人体的细胞。这场风暴已经撼动了细胞核的稳定，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家风正经历着风暴的吹打。

元朝王冕“牧牛晚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在网络游戏的击杀音效中显得苍白。有些孩子刷手机、玩游戏导致成绩下降为家长所苦恼。然而，质疑孩子自制力不强的家长，有多少不是把刷手机当成每天的“必修课”？

遥想杜甫笔下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珍重，人们对一封家书的期待承载着浓浓的亲情。如今信息的快速传递，让人们改变了交流方式，在微信里消解为碎片化的“早安”表情包。家庭群里抢红包的速度总是要比回复家长提问快得多。当年轻人聚在一起也用微信聊天时，他们又怎会喜欢听家长一天到晚的喋喋不休。

《颜氏家训》有言：“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惧而生孝。”千百年来，中式家庭教育如同庭院里的石阶，长辈居高临下，子女拾级而上。而今，数字时代的风吹散了单向训诫的藩篱，孩子们可以在各种网络平台上读《论语》、学历史、网络上讲的道理在他们看来比父母讲得更精彩，且态度更和蔼。孩子站在与家长一样的高度来寻求平等，家长的权威感眼看要碎成一地玻璃碴儿。

北宋司马光在《家范》中强调“积金”“积书”不如实际的家风德育，但今天的孩子更相信“不懂就问AI（人工智能）”，家长讲得未必透彻，高年级数学题的杀伤力可能会让本科毕业的家长缴械投降。孩子们站在搜索引擎的云端，反向俯视着父母的知识洼地。人工智能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父母的无力感。

数字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已然改变，以家长为权威、言传身教为模式的传统家风亦要顺应时代变化，与数字化结合，开拓一条家风新路。

家长首先要真诚地接纳数字时代的家风变化，先审视自己应如何与各种电子设备、人工智能相处。“正人先正己”，如果家长处理好了自己与手机的关系，不再是机不离手，那么，当引导孩子合理使用手机时，才能有足够的话语权。如果自己都沦陷在游戏的混战中，困于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里，这种言传身教怎么能换来孩子的尊重和敬畏？一句“你先做到再来管我”就直接封住家长的嘴。遇到这种情况，家长切勿因失去所谓的尊严而恼怒，更不可将怒气宣泄在孩子身上。越是想试图通过简单粗暴的方式夺回主导权，就越会激起孩子的抵抗，反而将其推向随时能为他们提供即时满足和情绪价值的虚拟环境。

古有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今有家长“防孩子用手机，甚于防川”，然而防不胜防。何不在可控范围内减少孩子与手机接触的频次，教会孩子合理使用手机，获得手机给生活带来的便利。孩子总有一天会脱离家长独自成长，如果他（她）没有建立起与手机、游戏的正确相处关系，很可能会沦陷其中，生活中这样的案例很多。防又能防到几时，防得了多少？堵不如疏，今后社会的数字化程度只会越来越高，无孔不入，何不及早寻找一种合理方式，发挥其优势，弱化其危害。

如果孩子无法戒断游戏，家长就要寻找降低危害的方法，比如可与孩子签订“游戏时段位兑换协议”，通关晋级赛胜利可兑换一项研读课，失败则需抄写一段文字。喜欢玩游戏的家长可以同孩子一起签订兑换协议，互相监督落实情况，把对立关系转化成伙伴关系。笔者的弟弟年轻时就是个游戏达人，水平可以达到比赛级，如今虽然实力退步了，但依旧每天手机不离手，一有时间就在网上组队打上几关过瘾。他总是为自己不能戒掉游戏而苦恼，老年机也买过，一回家就把智能手机锁到抽屉里的事也干过，但过不了多久就开始玩。如今他女儿已上高三，爱玩手机耽误学习的问题成了他的心病。如果弟弟能够下决心从自身做起，戒掉游戏，并引导女儿放下手机专心学习，二人结成监督互助同盟，相信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这个时代的孩子崇尚平等，强调自我主张，何不积极引导孩子成为宣传新时代家风的参与者、主导者，调动起孩子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让他们总觉得自己仅是被动接纳的改造对象。把原来训诫时“庭院的石阶”转化成“客厅的议事圆桌”，家庭成员共同讨论数字时代每个人应如何面对改变，如何从“我”做起。

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通过人工智能寻求解题答案；共同讨论学习问题、工作问题、生活问题、社会问题等；更可以共同制作家风实践短视频。将孩子对网络的关注转移到创作环境中，既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又可以学习新技术。例如，将家风讨论的内容、生活中实践的点滴小事通过短视频记录下来，小范围可以发到家族群里，大范围可以通过网络媒体传播。家庭内部可以定期开展“家风讨论”，每个阶段确定一个主题，譬如《朱子家训》提到的“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母亲可以援引古代节约粮食的事例，父亲可以寻找当代浪费粮食的反例，孩子可以采集全球粮食危机的数据，最后共同制定“家庭光盘行动”。用手机拍下讨论过程和后续落实情况，制成短视频传播，让传统节俭精神在数字化监督中焕发新生。

数字时代里，家风传承不能刻舟求剑，更不能亦步亦趋，而是要看到那些绵延千载的规训也可被数智赋能，闪耀在赛博世界的漫天星河里，为每个家庭标记传承的新坐标。

这一点，明孝宗朱祐樘可得赞赏。其二，据清道光《昆明县志》载：考湘潭张九钺《鸡枞》诗，注：“明熹宗嗜此菜，滇中岁驰驿以献。惟客魏（按即奸阉魏忠贤）得分赐，而张后（按即懿安皇后张嫣）不与焉。”其美味由此可想。

最后，说说笔者在家乡的土著彝族先民中收集到的两条关于鸡枞的谚语：“鸡枞不定根，摆夷遍地生”；“鸡枞一采，摆夷摆一窝”。其在对鸡枞的认识上有划时代意义。世人尽知鸡枞其物，却不知道有鸡枞与摆夷之分。曲靖人称鸡枞为“朵鸡枞”，称摆夷为“窝鸡枞”，即为显例。其实，历史上早已有先见于此。例如杨慎诗咏鸡枞为“一两枝”；而山地经验丰富的徐霞客，他吃到的就是“独出而大者”。《姚安县志》亦载：“旧时邑中多产细柄一种。近细柄之外尚有粗柄、大把、小把三种，尤以粗柄为佳。”按此“为佳”之粗柄者即为鸡枞，细柄者实为摆夷。清代桂馥《札朴》亦特加区别：“大而香者曰鸡枞，小而从生者曰一窝鸡。”而从文字上加以明确界定的，则仍为民国《宜良县志》。其书说：“摆夷菌：状类鸡枞，然色多白而较小，质带硬而味略逊。每出窝由十数本至百余本。”为此，笔者33年前曾撰文《漫话“摆夷”》，发表于1982年8月1日《云南日报》。就其名称来历及文化渊源详有考证。兹不赘述。

历史上早已有先见于此。例如杨慎诗咏鸡枞为“一两枝”；而山地经验丰富的徐霞客，他吃到的就是“独出而大者”。《姚安县志》亦载：“旧时邑中多产细柄一种。近细柄之外尚有粗柄、大把、小把三种，尤以粗柄为佳。”按此“为佳”之粗柄者即为鸡枞，细柄者实为摆夷。清代桂馥《札朴》亦特加区别：“大而香者曰鸡枞，小而从生者曰一窝鸡。”而从文字上加以明确界定的，则仍为民国《宜良县志》。其书说：“摆夷菌：状类鸡枞，然色多白而较小，质带硬而味略逊。每出窝由十数本至百余本。”为此，笔者33年前曾撰文《漫话“摆夷”》，发表于1982年8月1日《云南日报》。就其名称来历及文化渊源详有考证。兹不赘述。

鸡枞另有一种特殊吃法。祖籍保山的女作家半夏在其新著《在集市：昆明篆新农贸市场》中特别推荐的“鸡枞酱油”，不仅有新意，更见出地道云南人的食菌智慧。其书云：“就是把每一道洗鸡枞的水过滤澄清后滗出上层清液，然后放到柴火架着的大铁锅里加入盐巴熬煮，一直熬成浓稠的汁，用从前打零散酱油的量具灌到买者提供的铝壶、小口陶瓶罐里……这鸡枞酱油就相当于现在人们做菜时用于调味的味精、鸡精。”因为鸡枞“里面有丰富的氨基酸，其中的谷氨酸与盐一遇就化合成谷氨酸钠，谷氨酸钠就是味精的主体成分”。

我想，在放盐的同时再放点云南老酱，或在其中再投入些实体的鸡枞肉，这不就是梁武帝赞不绝口的蒟酱，即鸡枞酱了吗？此一新颖而古老的鸡枞吃法，加上久享盛誉的“鸡枞油”或称“油炸鸡枞”，是完全可以被携往省甚至国外的。倘真能如此，岂不美哉！

题图摄影：彭鸽子

满庭芳

第五三九九期

云南为野生菌王国。在众多野生菌中，最有文化的当首推鸡枞。《新纂云南通志》云：“此菌柄褶芳嫩，为食用菌之极品。”而鸡枞的咏诗，写得最有灵性的则出自明代著名学者杨慎笔下：“海上天风吹玉芝，樵童睡熟不曾知。仙翁住近华阳洞，分得琼英一两枝。”（《沐五华送鸡枞》）

关于鸡枞的出产地，李时珍《本草纲目》明确指谓：“鸡枞出云南”。清代历史著作《滇系》更载有咏物品极最高的昆明杨永芳《鸡枞赋》一篇，谓“维滇南之异产兮；别其名曰蒙枞”，可知在大国民时即已得称。又说：“厥开拳于钩弋兮，菰见味于唐人。”此见味于唐人者，有段式《酉阳杂俎》。其云：“蒟酱，鸡枞也。取枞之鲜者蒸为汁；味如酱。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在位）日唯一食，止菜蔬。蜀献枞酱，啖觉美，曰：‘与肉何异！’敕复禁之。今鸡枞味与肉同。蒟蒻，当亦蒟类。”明正德《云南志》卷二亦载：“煮食味如鸡肉。”鸡枞之得名，从其形味求之可也。

至其食用之法，由昆明市食品公司编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出版的《云南菜谱》一书，则详载为肉油鸡枞、火腿清蒸鸡枞、椒盐鸡枞、如意鸡枞、椒盐柴把鸡枞、菜心炒鸡枞、锅贴鸡枞、鸡枞炒鱼球、油鸡枞及鸡枞腰片汤等共十款佳肴。其中，被列为宴席菜的有肉油鸡枞、椒盐鸡枞、如意鸡枞、椒盐柴把鸡枞、锅贴鸡枞、鸡枞炒

鱼球等六款。民间食法，实不外乎此也。

而鸡枞的出产时节，则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段：

一、菌谚云：“五月端午，鸡枞拱土”，这是鸡枞出土之发端。

二、火把节时为其高潮。杨慎《渔家傲·其六·滇南月节》云：“六月滇南波漾者。水云乡里无穷暑。东寺云生西寺雨……松炬荧荧宵作午。星回令节传今古。玉伞鸡枞初荐俎……”

三、秋分节气为其尾声。《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十二》记明崇祯己卯（1639）：“八月二十日……先是余从途中，见牧童手执一鸡枞，甚巨而鲜活。时鸡枞已过时，盖最后者独出而大者。余审之，至是渝汤为饭，甚适。”

关于鸡枞的民间故事，笔者在《神奇的九乡》（1992）一书中收录有《鸡枞血泪》一篇，因文中所陈其事凄苦，在这里就不再复述。《中国民间故事

上述传说，因修纂民国《宜良县志》的许实先生，其家距章堡村仅一公里，又其书成于1921年，仅相隔三年。古语云：“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因此为可信，殆非虚言也。为此，笔者在1980年代亲往该村采访核实。村民告以县志所载者姓张，因最擅拾菌，人称“鸡枞老倌”。他听说家里金中生菌，即第一时间赶到，并将该鸡枞的顶帽处立即掐下，当场就生啖了。据村民讲：鸡枞顶帽处被俗定为鸡枞的眼睛，是鸡枞出土后“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点，其眼睛黑泽亮如睛眸，故称。民间传说，吃过鸡枞眼睛的人，眼睛特别尖，进山拾菌，最能找见菌子。故其说为真实不虚也。

关于鸡枞，还有两桩关系到明代皇帝的雅事。其一为清雍正《云南通志》所载：明孝宗时，光禄寺以鸡枞进御。上食而美，将复取，辄止。近臣请故，上曰：“朕索后，必预储以待，为费多矣。”仅凭



郑祖荣

文话鸡枞

古钱币印证历史

章用秀

1985年11月7日，在望海楼教堂东狮子林大街小学建筑工地上，相关人员发掘出数十吨铁锈古钱。

古钱币出土方位在海河上游，三岔河口故地，在地表2米以下。其暴露部分方圆有十数米，出土古币大部锈结为一个整体，表层有约20—30厘米厚的散乱铁钱币，结块的锈币可清楚辨认出不规则码放的成吊钱币，并带有穿钱用的铁丝和麻绳痕迹。由于锈结严重，纵深无法勘察，出土钱币估计有数十吨之多。如此大批量的铁钱币出土，不仅在天津堪称空前，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也属罕见。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在距古币出土地点以东50米处，就是清军水师营炮台遗址，此处先后于1937年4月和1983年10月出土古炮两门，清理出古炮台地基和梅花木桩、炮口封门子等。这些发现为勘察